

●岳剑波

走向信息时代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

西方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正规教育,是以杜威1887年1月5日在纽约哥伦比亚学院创办的图书馆经营学校(School of Library Economy)为开端的。正如米克萨所指出的,图书馆经营学校的建立,标志着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机构需要专家、有专业知识的图书馆员来加以管理的开始,她也预示着图书馆学——以专业知识、应用这些知识的技能以及服务精神的三们一体为特征——作为一门自觉的科学学科的诞生。

1986年6月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了纪念正规图书馆学教育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会议回顾了西方图书情报教育的发展历史,重点讨论了图书情报教育的现状与未来趋势。100年来,西方的图书情报教育大致经历了19世纪末的萌芽时期(1887~1900)、20世纪初的发展时期(1900~1921)、20世纪前半叶的改革时期(1921~1950's)、60~70年代的繁荣时期和80年代的回落时期。为了探寻图书情报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律,更加准确地把握其本质,为图书情报工作培养有用的人才,图书馆学情报学家、教育工作者都在不断地对图书情报教育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所发表的研究成果在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中始终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本文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对西方图书情报教育研究的基本状况进行综合评述,以便为我国图书情报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改革提供一点借鉴。

一、历史回顾:理论与实践之争

随着图书馆向社会开放,人们逐渐认识到

需要一种新型图书馆员。他们除了是一个学者外,还应具备组织和经营能力。19世纪中叶,许多著名人物都强调了适当地训练图书馆管理人员的必要性。德国的施雷廷格可以说是提出用专门学校来培训图书馆员的第一个人。早在1829年他就指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即使是一个伟大的学者,如果没有经过专业学习、准备与实践,也不适于做一名图书馆员。”^[1]他建议由国家图书馆创办一种图书馆员的培训学校,为各类图书馆提供毕业生。1886年,德国哥廷根大学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图书馆学教授职位。意大利和瑞典也效仿德国,几乎与杜威同时创办了图书馆学校。英国虽然早在1885年就于伦敦和诺丁汉举行了授予图书馆员资格的考试,但直到1919年才在伦敦大学研究生院设立了第一所图书馆学院。在此之前,人们一直是依靠自学图书馆学来取得图书馆员资格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欧洲,图书馆学校的课程主要是为了使學生准备通过图书馆员资格考试而设置的。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使得以培训图书馆员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教育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1876年成立的美国图书馆协会(ALA)早就开始组织各图书馆馆员之间的交流。在1881年的ALA年会上,“需要受过培训的图书馆员”成了年会的主要议题。1883年,杜威曾向年轻的ALA提出建立正规的图书馆学校的建议。他在建议中描述了把图书馆经营学校建成为一个图书馆工作教学与实践培训中心的构想。于是,ALA年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考虑图书馆教育的各种方案和计划。1900年,由J.戴纳领

导的“图书馆学校和训练班”3人委员会首次提出,ALA应对图书馆学校及训练班进行认可审查。1905年,委员会在M.普卢默的领导下提交了“图书馆训练标准”的报告,对图书馆学校的招生与教师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杜威在创办图书馆经营学校的同时,也对图书馆学教育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作为“实用图书馆学派”的宗师,杜威认为图书馆学教育就是要为当时蓬勃发展着的图书馆事业提供实用人才。他在图书馆教育中强调图书馆实际工作技能的培养与训练,用杜威自己的话说是“正规学徒制”。杜威还在1902年的一篇文章中建议,应建立一个图书馆学校协会来维护自己的教学水平,讨论教育问题。但是,直到1915年,美国图书馆学院协会(AALS)才正式宣告成立。而且该协会只接纳正规大学所属的图书馆学院,拒绝接受各图书馆开办的图书馆员培训班入会。

在杜威创办图书馆经营学校10多年后,美国又建立了几所著名的图书馆院校:普拉特学院图书馆学校(1890年由杜威的学生普卢默创办于布鲁克林)、阿穆尔学院图书馆学系(1892年由杜威的得意门生K·夏普创办于芝加哥,后迁往伊利诺斯大学)、德雷克塞尔学院图书馆学校(1892年建于费城)、锡腊丘兹大学图书馆学院(1897年建于纽约)、西蒙斯学院图书馆学校(1902年建于波士顿)、西部储备大学图书馆学院(1904年建于克利夫兰),等等。这些学校的教学计划都是纯技术性的,所开设的课程内容以图书馆工作实际技能为主,与杜威的学校大同小异。初期的图书馆学教育及其研究都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

1903年卡内基公司开始注意到图书馆学教育问题。除指资兴建图书馆院校外,该公司还拨款进行有关图书馆学教育问题的研究。1919年,C·威廉森在卡内基公司的支持下,就培训图书馆员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于1921年完成了对15个图书馆学院的调查,最终于1923年发表了著名的“威廉森报告”:《图书馆服务的训练》^[2],就图书馆教育问题提出了11条重要建议。他在报告中抨击了图书馆教育的

现状。他指出,图书馆教育质量欠佳,缺乏标准,其课程设置过分偏重于技术方面和具体工作经验,而忽视了图书馆学的原理和理论问题。他主张,图书馆学院应与其它学科专业一样隶属于大学,以便融合在整个学术环境中。图书馆院校应把重点放在专业人员教育,而不是事务性工作人员的培训上。

威廉森报告不仅对当时的图书馆学教育界,而且也对整个图书馆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可以说它是美国图书馆教育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该报告的推动下,ALA于1924年成立图书馆教育委员会(ALA/BEL),负责对图书馆学教育计划的评估与认可。也是在该报告的影响下,卡内基公司于1926年资助建立了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研究生院,并开设博士课程。这亦为美国图书馆教育史上的重大进步。正如当时的卡内基公司主席所说:“新型的图书馆研究生院将使图书馆员可拥有与哈佛法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毕业生相似的地位。”

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研究生院创业伊始就把西方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理念之风带入了当时还只是一种职业的图书馆领域。特别是在1932~1942年L·威尔逊出任院长期间,他制订了专业研究与专业教育并重的发展战略,率领所有教员为培养新型图书馆员不断开拓。1933年,该院教授P·巴特勒的巨著《图书馆学异论》出版,对图书馆学教学与研究影响甚大,并一举确立了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研究生院“理念图书馆学派”的代表地位,开始与比之早40多年、由杜威创立的“实用图书馆学派”分庭抗礼。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该院1944年毕业的博士J·H·谢拉。他于1956年开始在卡内基公司资助下研究图书馆学教育问题,最终于1972年出版了《图书馆学教育的基础》一书^[3]。谢拉在书中试图赋予图书馆学教育更强的理论性,强调其跨学科发展的前景,并在50~60年代图书馆工作与技术环境迅猛变化的广泛背景下探索图书馆学教育的一般原则和应变对策。谢拉认为,图书馆学教育应该是以强化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为目标的,即培养“作为学者的图书馆

员”。这样,无论他们在什么岗位,都能胜任本职工作。他甚至不赞同把专业实习作为教学内容。他的名言“经验是智慧之源,也可能是错误之源”反映了当时西方图书馆学教育界相当一部分人对实践教育的态度。

1936~1946年间还有J·丹顿等人发表了6篇关于图书馆学教育的调研报告。这些报告大都承袭了威廉森报告的观点,有力地支持了图书馆学理论教育的发展,并且为战后图书馆学教育的改制(设立一年制图书馆学硕士课程,确定以硕士学位作为图书馆员的第一职业学位)奠定了基础。

尽管有威廉森报告的强烈呼吁和图书馆学教育界的积极响应,图书馆学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1980年发表的《科南特报告》表明^[4],大多数图书馆院校都试图在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中保持平衡。莫尔黑德在《图书馆教育的理论与实践》^[5]中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主张“把蛋糕做大一点”,认为解决理论与实践难题的方法应该是扩大理论教学的内容,同时不可忽视实践对于理论的价值。丹顿、梅特卡夫、贝雷尔森等人力主在课程中削减技术或事务性内容并非解决问题的公正办法。

二、内部冲突:情报学教育的崛起

二次大战后,充满活力的情报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文献信息交流学科迅速发展,给图书馆学带来了新的气象。与此同时,情报学也开始在图书馆学教育领域立足。1950年,H·福克在西部储备大学图书馆学院开设了两门文献学课程。M·陶布也于195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授文献学方面的课程。1958年于华盛顿召开的国际科学情报会议止,G·玻恩提出了“科技文献工作中的活动培训”问题,引起了人们对情报学教育的关注。1961年和1962年,在乔治亚工学院连续两次召开了训练科学情报专家的会议。此后,美国文献学会(ADI)、国际文献联合会(FID)也先后召开了情报学教育会议。这些

会议广泛地探讨了情报教育的目标、课程等方面的问题,对情报学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情报学教育的崛起首先引起了图书馆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的注意。1956年,J·佩里和A·肯特在西部储备大学图书馆学院院长谢拉的指导下建立了文献与交流研究中心,对初显端倪的情报检索教学研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后,美国各大学纷纷开设情报学方面的正规课程。乔治亚工学院的V·斯拉麦卡、俄亥俄州立大学的M·约维茨、芝加哥大学的D·斯旺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R·海斯和H·博克等,都是这方面的先锋人物。传统的图书馆学教育开始受到情报学教育的猛烈冲击。1964年,匹兹堡大学率先将所属的图书馆学院改称为图书情报学院。70年代末,美国已有30%以上图书馆学院在校名上添加了情报一词(英国和加拿大也紧随美国,把图书馆学院/系更名为图书情报学院/系,但欧洲大陆国家受传统的图书馆学教育影响太深,以致于迟迟未对情报学教育作出应有的反应)。截止到1988年,在ALA认可的60多所院校中,只有7所,在单位名称中只使用图书馆而未增加情报一词。

学校改名意味着教学计划与课程设置的变化。1960年,美国仅有5所学校开设文献管理之类的课程,另有9所学校开设了视听资料课程。到1968年,已有27所学校开设“图书馆自动化”及“资料处理”课程,34所学校开设了“情报科学”、18所学校开设了“视听资料”课程。1972年,ALA在所认可的57所学校(美51所,加6所)中对50所院校的课程设置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情报科学”被所有学校开设,16%的学校列为必修或为核心课程之一。其它加“图书馆系统分析”、“情报检索”、“图书馆自动化”等情报学方面的课程亦在不断增加,在UCLA、西部储备、芝加哥、匹兹堡等校已占选修科目的三分之一。面对内容繁杂的课程目录,ADI试图完善情报学的课程体系,委托J·贝尔泽等人于1965年调查硕士学位的课程设置

青况,1972年又全面调查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课程设置,对其教学大纲进行综合分析,提出了比较理想的教学大纲。此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为协助各成员国实施有关情报教育的计划,也在欧洲的8个国家调查了为培训情报专家而设置的课程情况,1973年由H·舒尔提出研究报告。但上述调查研究的重点是放在情报学教育方面,没有考虑到情报学与图书馆学之间的关系,故而对图书馆学院的情报学教育影响不大。70年代,许多图书馆院校都在审查自己的课程体系,纷纷增设诸如“情报存贮与检索”、“图书馆自动化”、“计算机程序设计”、“情报系统分析”等课程,但由于未能解决好同原有课程的衔接与结合问题,这种生硬的组合给人以“新瓶装旧酒”的感觉。

情报学教育的崛起给传统图书馆教育带来的最为尖锐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情报学在图书馆学中的地位,如何把新的情报学内容同传统的图书馆学课程结合起来,或者说怎样来重新确定图书情报教育的核心课程。所谓核心课程,按照谢拉的定义,是指作为专业哲学的统一基础理论,在课程表中表现为所有学生都必修的基本课程。谢拉相信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具有共同的哲学基础,它们的教学大纲也是可以聚合为一个整体的。他提出,情报学不是改头换面的图书馆学或情报检索,也不是它们的对立面。情报学是为图书馆工作提供理论知识基础的一门学科。图书情报教育应在传统的图书馆学核心课程(采选、分编、参考、管理)上逐步增加情报学方面的丰富内容,以反映出情报专业各部门的广泛基础。其实,谢拉并非持有此类观点的一个人。早在1967年,里斯和里西欧就注意到了在图书馆学院中增设情报学课程的情况,提出应重新定义图书馆教育的目标,强调其跨学科性质。1977年在北卡罗莱纳大学召开了一体化核心课程研计会,会议提出了“一体化核心”的观点,寻求图书情报教育课程的整体有机综合。然而,在听取了几所院校的试行报告后,G·加里森觉得人们对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基本内容及其与整个信息世界的关系还有很大的认

识差异。他认为,我们首先应该明确,情报专业比图书馆学要大得多,情报专业教育的范围也比现有的图书馆学教育要广泛得多。弄清这个问题,恐怕比有关核心课程的任何讨论都重要^[6]。70年代,UCLA等大学的图书情报学院进行了许多试验。但直到80年代,“核心”问题仍未解决。随着情报学对传统的图书馆学教学计划的影响日益增加,这个问题也愈加复杂化、多样化了。

由于现代化信息技术在图书情报工作中的广泛运用,信息技术在图书情报教育中的地位问题被提了出来,这使理论与实践的争论又成为新的焦点。信息技术教育是对学生实践技能的培训。E·霍利指出,图书馆不需要专业理论家,而是需要掌握了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实干家。现在已很有必要扩大图书情报教育计划,把专业实习、技术培训等内容包括进来^[7]。科南特报告也批评图书情报学院缺乏适当的实践教学^[8]。虽然该报告由于调查样本等问题受到非议,但有关建议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重视。ALISE 1985年发布的《图书馆和情报科学教育统计报告》表明,信息技术方面的课程在新增设的课程中占主要地位。总之,80年代以后,西方图书情报教育界逐渐抛弃了谢拉的“理论教育”观点,开始向实践教育方面倾斜。

三、危机、挑战与出路

70年代末,西方的图书情报教育开始萎缩。许多图书情报学院内外交困,举步维艰,最后不得不“关门大吉”。1978~1992年间,光是美国就有14所院校倒闭(见表1)。最令人痛惜的是,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研究生院竟在1990年6月宣布“暂停营业”;而资格最老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服务学院也几度遇险,终于1992年倒闭。面对图书情报教育日渐衰退的趋势,M·帕里斯惊呼图书馆学教育遇到了百年来最严重的危机;加里森则指出,图书情报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

霍利和帕里斯分析了图书情报教育面临危

表1 美国图书情报学院倒闭情况

关闭图书情报学院的大学	关闭时间
俄勒冈大学	1978.8
阿拉巴马 A&M 大学	1981.2
西密执安大学	1983.6
纽约州立大学吉尼索学院	1983.8
密西西比大学	1984.12
明尼苏达大学	1985.6
鲍尔州立大学	1985.8
丹佛大学	1985.8
凯斯西部储备大学	1986.6
南加州大学	1986.6
皮博迪/范德比尔特大学	1988.8
爱默里大学	1988.8
芝加哥大学	1990.6
哥伦比亚大学	1992.?

机与挑战的背景。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归纳为:(1)竞争:信息社会需要大量具备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知识的人才。根据德本斯和金等人在1981年的调查,1980年美国的信息专业人员约有164万,其中图书馆员仅占10%。各高等院校为培养信息专业人才与图书情报学院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计算机系开设信息科学课程,商业管理学院开设信息管理课程,其它专业学院也纷纷涉足信息教育。然而,保守的图书情报学院并没有马上采取应变措施,直到一些很有影响的教学计划被终止,才感觉到校内外的沉重压力。(2)差距:本来,信息产业的兴起为图书情报学院的毕业生提供了广阔的就职天地。以往图书馆是毕业生的主要雇佣单位,可现在却有出版社、情报部门、政府机关、工业企业等领域为图书情报学院的毕业生提供工作机会。1986年格里菲斯和金的研究报告指出了12种可能的就业场所^[9]。但是,图书情报学院的教学内容较为单调。那种相当谨慎小心地将情报教育嫁接在现有专业教育或学科课程上的做法很难满足信息产业的需要,致使雇主对毕业生的知识结构和工作能力感到不满。(3)职业声望:在西方,如美、加等国,是把硕士学位规定为图书馆员的

第一职业学位的。图书馆员在社会各行业中教育程度较高,工资待遇却较低,致使图书馆职业声望不高,图书馆学院招生人数连年下降。美国的在校图书馆学硕士生从1979年到1983年下降了12.8%。(4)经济压力:随着西方国家经济的普遍衰退,通货膨胀的持续和政府资助的减少,教育经费日趋紧张。而图书情报学院在大学中又历来不受重视,缺乏知名度和可见性,用谢拉的话来说,“更是在图腾柱的底层”,因此,资金紧缺首当其冲。这对处于变革与竞争关头的图书情报学院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私立学校压力更大。表1中所列的第8~12所学校均为私立大学。

为了克服危机,迎接挑战,西方图书情报教育界的专家们在努力探索进一步发展图书情报教育的途径,提出了种种对策。主要集中在加下几个方面:

1、“外引内联”,合作办学。1986年M·凯尼格的文章《情报管理教育:竞争还是合作?》在西方图书情报教育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凯尼格认为,图书情报院校应当正视商业管理学院信息专业教育所带来的竞争形势,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10]。1987年ALISE年会的主题是“情报科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会议上,拉特格斯大学“传播、情报和图书馆研究”博士计划的负责人B·鲁宾认为,信息时代的社会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学科界限。他提出要重新定义研究生教育的边界,把图书情报教育与计算机科学、商业管理、工程技术等专业的信息教育联合成一个“信息教育共同体”。联合的目的是把有关信息专业教育的不同学术单位合并起来,建成一个更大更可见的学术单位,以避免重复,同时便于在校内外竞争资源。夏威夷大学图书馆研究生院院长M·杰克逊还在会上介绍了他们联合校内4个学术单位(图书馆研究生院、决策科学系、信息和计算机科学系以及传播学系)合办跨学科博士计划的做法。其它象匹兹堡大学、普拉特学院、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和布法罗分校、多伦多大学、达尔豪西大学、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等都有类似的合作博

士计划。但是,由于各学术单位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图书馆学带有强烈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经验传统,而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等则以分析方法为基础),这些联合既有成功的典型,也有失败的例子。

2. 拉开层次,加强专业化教育。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传统上通用型的图书馆员已满足不了信息工作领域多样化、专门化的要求。R·海斯认为,图书情报教育应该在以下四个层次上培养人才:情报专家、情报系统管理者、情报系统设计者、情报学家。教育层次的划分尚无统一标准,一般对于以应用信息技术为主的初级教育认识较一致,对中高级人才的培养问题争议颇多。在拉开培养层次的同时,西方图书情报院校还注意加强专业化教育。专业化的方向分别按照图书馆类型、情报功能、用户类型、学科领域等来划分。在ALA支持下,美国的专业化教育起步较早,发展较快。在1977年的59所被认可的学校中,有55所开设了专业化课程。这反映出美国图书情报教育对社会环境与需求的敏感性。相比之下,欧洲受传统的“学者图书馆员”的思想影响太深,在专业化教育方面起步稍迟。现正他们已认识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例如英国已经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国家委员会来考虑图书情报教育问题。现正制定两个教学计划:一个是获得情报学与药物化学、材料技术、人类工程及其它学科的理学硕士学位。另一个是为理科硕士生开设情报管理课,以满足毕业生对信息技术与情报管理的需要。这类课程包括情报环境、情报研究、情报管理等。

3. 修改教学大纲,更新教学内容。要求对图书情报教育的结构与内容进行彻底的改革,成了实际工作者、用户、学生和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呼声。现在人们普遍对图书情报院校的教学内容感到不满。那么,究竟应该作哪些革新,以适应社会与技术变革的需要呢?S·里德指出,课程应能反映和响应图书馆所发生的变化,这包括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在图书馆过程和服务中的应用及图书馆管理人员的培训等。D·福斯克特则指出,不应允许技术来支配教育目标

和教学过程。为了避免过分强调技术,在课程表中应对用户及其需求的研究、情报传递的社会作用等给予更多的重视。当前,围绕着图书情报教育的目标、任务和教学内容,西方学者们正在进行激烈的争论。加里森告诫说,更新教学内容,所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在传统课程上增加几门新课。他指出,有必要对图书情报教育界和我们的课程表进行根本性的改组。重新定义图书馆学院是培训情报人员的地方。H·博克进一步提出,情报学和信息技术在核心课程中应占有象“参考”和“编目”一样的地位。由此,应该形成一门统一的学科(Library Information Science),而不是用“和”联系起来的两个独立的学科(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4. 扩充教学计划,改革学制与学位。由于图书情报教育内容的革新与扩展,专业化教学内容不断增多,培养时间和学位结构成了许多论文和会议的讨论主题。1975年阿什海姆发现图书情报学院出现了减少必修课的数目,增加选修课的数目,并延长硕士学位学习计划的迹象。近几年,一些美、加的图书馆学院已经或正在考虑采纳两年制硕士计划。他们认为,这不仅可以满足专业化学习的要求,使学生既能掌握基础理论,又可增加实习机会,而且,通过延长学习期限,也可能会缓和当前招生来源不足和就业市场疲软的困难。另外有一些学校,如匹兹堡、锡腊丘兹、德雷克塞尔、拉特格斯等,则开设了情报学本科生课程甚至提供本科生计划,以吸引更多的学生,提供更加广泛的就业机会。80年代以来,与图书馆学硕士生注册人数不断下降的情况相反,学习情报学的本科生人数却在连年增加。

5. 重视继续教育。图书情报人员的继续教育问题在60年代以前并未受到多少注意,S·罗恩坦曾称之为“无娘的孩子”。信息技术与信息产业的发展,使在职图书馆员面临着知识更新问题。E·斯通最先提出了图书馆学院在继续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11]。在她的呼吁下,AALS于1973年提出《图书情报继续教育政策声明》,并由新成立的AALS继续教育委

员会于1981年进行了修订。《声明》鼓励图书情报学院发展继续教育计划。到1985年,在ALA认可的59个图书情报学院中,39个有提供硕士后证书计划,用以培养在职人员。1985年8月举行了第1届世界图书馆和情报专业人员的继续教育会议。这标志着继续教育已成为图书情报人员终身教育的一个基本因素。

西方的图书情报教育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程。未来的图书情报教育究竟向何处去?80年代中期以来,博克、巴克兰、霍利、怀特等人进行过多次趋势分析与预测。总结起来,未来的图书情报教育将呈现出如下的发展趋势:

1、“一体化”的办学趋势将愈演愈烈。图书馆情报学、商业管理、计算机科学、工程学和传播学这5个与信息领域有关的学科必将进一步携手合作,构成一个统一的信息科学共同体,采纳联合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学术机构的重大改组和重新定向,如从图书情报教育转向强调能在社会各部门从事信息工作的信息专业教育。

2、“多元化”的教学模式将日益明显。随着教学计划的扩展和学生兴趣的多样化,信息领域里的各专业教育必将立足于广义的信息概念,综合和吸取相关学科有价值的内容,并赋予新的形式。图书情报教育将进一步发展如工业档案、情报存贮与检索、企业和政府情报资源的管理、出版业与数据库产业之类的专业化教育。这可能要求重新考虑核心课程问题。

3、本科生计划将逐渐增加,以满足社会对初级信息专业人员的需求。两年制硕士由于经济压力不会明显增多。然而,在硕士证书计划中将会出现若干不同的发展方向。如增加各个领域的专业选修课程,鼓励学生选修此类课程并获取专业证书。

4、信息技术对图书情报教育已经产生了、而且必将产生更加重大的影响。图书情报教育将继续保持其人文科学的方向,强调信息传递的社会作用,以此与强调技术保持平衡。

5、继续教育将会受到更多的重视。正规图

书情报院校将提供形式更加多样、内容更加广泛的连续教育计划和课程,以更新在职图书馆员和情报专家的知识。

6、图书情报院校的数量不会有明显的增长。用萨默的话说,“如果图书情报教育界‘平安无事’(指没有图书馆学院倒闭),那就是最大的好事”^[12]。

参考文献

- 1、2 William Z. Nasri. Education in Librarianship. In: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ew York: Dekker, 1970, 7: 414~465
- 3 Jasse H. Shera. The Foundation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New York: Becker & Hayes, 1972
- 4、8 Ralph W. Conant. The Conant Report: a Study of the Education of Librarian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0
- 5 J. Morehead. Theory and Practice in Library Education: the Teacher—Learning Progress. Littleton, Co: Libraries Unlimited, 1980, P. 5
- 6 Guy Garrison. Needed: a Core Curriculum for a Diversifying Profession. J.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1978, 19 (2): 179~183
- 7 Edward G. Holly. Extended Library Education Program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Advances in Librarianship, 1981, 11: 51~76
- 9 Griffiths and King. New Direction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White Plains, N. Y.: Knowledge Industry Pub., 1986
- 10 M. Koenig. Education for Information Management: Competition or Cooperation? Library Trends, 1986, 34(4): 715~728
- 11 E. Stenc. Continuing Education in Librarianship: Ideas for Action. American Libraries, 1970, 1: 543~51
- 12 E. Holly. Into the Second Century: the library Education Centennial, 1986—87. The ALA Yearbook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1987, 9~13

岳剑波 1985年北京大學圖書館學情報學系畢業,現為該系講師。發文10余篇。通訊地址:北京海澱中關村,郵編100871。

(來稿時間:1992-03-27。編發者:劉喜中。)

Subject thesaurus — China

G254.2

Collected Essays on "Tianyi Pavilion": Preface /Gu Tinglong. 56—57

The "Collected Essays on Tianyi Pavilion" falls into 12 chapters in all and is about to be published b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Luo Zhaoping, the author, knows both the history and the collection of Tianyi Pavilion very well. Having read the book, I was deeply convinced that a qualified person is here to take charge of the collection and keep it in good condition. At present,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for the management of rare books is to reprint them so as to hand them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ianyi Pavilion — History

"Collected Essays on Tianyi Pavilion" — Book reviews

G256.4

Library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Zhang Yanlie. 58—60, 46

Library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hould be divided into four level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objects, namely: basic theory study, applied theory study, applied technical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ve practice. The empirical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libr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ould be recognized, an active part should be taken to discover new problems from experiences and technology, the achievements in knowledge science and thinking science should be exploited and lastly, the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should be enriched. 1 illus. 1 references.

Library Science — Modes of subjects

Library work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250

An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in Japan / Lai Maosheng. 61—66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there are in Japan 1167 institutes set up within 188 universities, among which there are 2 universities, 13 institutes, 77 courses and 64 specialize subjects containing the word "information". After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the courses offered and the direction in which the university graduates have gone of 3 of the universities the paper holds that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in China should derive 6 useful messages from them. 2 tabs. 2 ref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 Japan

G250—1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Heading for the Age of Information /Yue Jianbo. 67—73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are now heading for the age of information. The paper traces back to the history of studies made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in the West and on the basis of making an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practice and theory, analyzes the impacts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t then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trend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of the West. 1 tab. 12 refs.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 The West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Impacts

G250—1

Views on Library Exploitation of Literature Resources /Feng Jinsheng. 74—76

Library exploitation of literature resources, so to speak, indicates that library workers, by means of various